

418  
国际古迹遗址日  
INTERNATIONAL DAY FOR MONUMENTS AND SITES

## 对建成遗产话语范式的再认识

常青

## 遗产意涵

“建成遗产”是文化遗产中经由建造活动形成的保护对象,狭义本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成立时的核心概念——“历史纪念物及遗址”(Monuments and Sites),属文物古迹范畴(不可移动文物),如今其外延已大幅扩展,以致所有具历史保护价值的建筑物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都属建成遗产话语讨论的范畴。

ICOMOS在1999年墨西哥会议通过的宪章中,首次提出了“建成遗产”的概念(Built Heritage)。今天看来,建成遗产可包括建筑遗产、聚落遗产和景观遗产三大类。

建筑遗产我国将之分为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两大部分(许多已具备双重身份)。聚落遗产是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场所精神的人类聚居空间,可分为城镇聚落遗产和乡村聚落遗产两大类,这一概念包含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及所属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以及古代聚落遗址等。景观遗产也称“文化景观”,有广狭两义。广义指“特定文化族群所塑造,受到土地、气候、植物等自然生态因素影响的文化区域”;狭义则指文化遗产的特殊类型:人工嵌入天工的“文化地景”,如西湖、庐山、五台山、广西花山岩画、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等“世界文化遗产”。

建成遗产不仅包括物态的“实体空间”,也关联着非物态的“文化空间”,诸如集体记忆、文化习俗、节庆仪式、匠作技艺等。实体空间与文化空间水乳交融,被称为“文化场所”或“文化属地”。这些都可概括为被建成遗产所赋值的“历史环境”或“历史建成环境”。

## 话语转换

20世纪20至30年代为第一阶段。1926年法国巴黎成立“国际智识合作组织”,其下属“国际博物馆事务办公室”(IMO)于1931年在雅典主办了“关于历史纪念物的建筑师与技师代表大会”,推出关于历史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还问世了另一部《雅典宪章》,其中亦有保护“历史中心”的章节。1946年“国际博物馆理事会”取代了IMO的功能,后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所属机构。

20世纪50至60年代为第二阶段。1957年巴黎召开了首届“关于历史建成物的建筑师与专家代表大会”,呼吁创办“国际文物保存和修复研究中心”(ICCROM),1959年该中心正式成立。1964年第二届代表大会在威尼斯召开,通过了关于历史建成物保护与修复的《威尼斯宪章》,倡议成立“国际历史建成物及遗址理事会”(即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为非官方的国际咨询机构,影响及于全球,1965年在波兰华沙正式成立。

20世纪70年代至今为第三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发布《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又成立“世界遗产委员会”,负责对公约的具体实施。

上述遗产话语从可移动文物的博览对象,向不可移动的历史建成物转换,最终形成了建成遗产的话语体系。其确保了延续建成遗产的两种价值属性并付诸实践过程:一是其可展示及可解读的博览功能属性,不会因硕大的建成尺度和不可移动性而改变;二是其建成物的营造技艺属性,必然需要文博专家、保护技师和建筑师的联盟及协同工作,才能实现保护传承的目标。

## 中国清单

根据国家文物局和住建部发布的保护清单,自1961年颁布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暂行条例》以来,迄今被认定的国家级建成遗产及其历史环境的数量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1座,名镇312个,名村487个,全国历史文化街区970片,历史建筑4.27万处。

国家有关部门“推动的”传统村落8155个,20世纪建筑遗产298处,57项文化与自然遗产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文化遗产占多数,共39项)。这些具有“显著普适价值”的“中国”“世遗”数量仅次于意大利,居全球第二。

除了上述国家级清单,还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及以下的各层级、各类型数量庞大的建成遗产。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后,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猛增至逾77万处。

## 遗产批判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大卫·罗温塔在《遗产圣战与历史易帜》一书中指出,“在失去和变化的恐惧中,唯有紧紧抓住残剩的定力,方能从容应对,不乱方寸”。他所说的定力其实就是遗产。同时书中对遗产过热现象的批判异常辛辣犀利,事实上这样的弊端显然不止发生在西方,更是随处可见的全球现象。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原“中东研究所”所长奈扎尔·阿尔萨依德,在其《建成环境中的传统:“真实”、“超真和拟真”》一书中,将传统变化趋势归纳为三种现象:一为代际相传、残存于世的“真实”传统(“Real”-Tradition);二为受到疆域打破、文明冲突、乌托邦实验、神话塑形等激发,随之出现的全球化反向衍生现象——“超真传统”(Hyper-Tradition),如拉斯维加斯的历史地标仿造群,迪拜的阿拉伯风格巨构建筑群,风靡全球的迪士尼梦幻乐园等,这种“超真传统”在“后全球化”的复杂文明交集背景下,更会穿越时空,层出不穷;三为虚拟现实技术及遗产话语助推下的“拟真传统”(Virtual-Tradition),正以遗产数字化保存、展示和全新演绎方式,颠覆性地改变着世人对传统和遗产的认知。阿尔萨依德的上述讨论,为当今建成遗产保护传承与历史环境活化再生,提供了新的观察视域和思考途径。

## 知行之间

“保护”是前提,其宗旨是管控变化,而不是阻止进化。广义的保护包括了遗产本体的原物保存、原样修复、依规翻建,以及合法复建和加建。保护的目的一是要留住空间和场所的历史记忆,二是要激发艺术和审美的现代情感,三是要传承适地和体宜的建造智慧。

“更新”一般是对旧区和旧物而言,并不包含需要保存的历史保护对象。西方在50至80年代的城市更新是以新代旧的开发性为主,但在开发“红利”逐渐销蚀的同时,保持城市可读性和可识别性的呼声也渐有回响,循环利用和活化再



巴黎左岸奥赛火车站



北京798文化艺术产业园

## 生渐占上风。

“再生”的中文本义是“修旧利废”,指对残缺遗产本体进行修复复形,必要性复建及合法性翻建,在功能废弃后进行重塑活化,也即再生是以保留提质为主导,比更新更注重空间和场所两个层面的相辅相成。可以说,再生是更新的适应新途径。

实际上,西方介入建成遗产保护传承和历史环境活化再生的杰出建筑师及其作品,一直在探索当代保护创新途径。如罗伯特·文丘里的富兰克林故居遗址标识性保护,诺曼·福斯特的柏林议会大厦穹顶再现,彼得·卒姆托的科隆柯伦巴艺术博物馆于教堂遗址上的古今拼贴,以及大卫·奇普菲尔德的柏林历史博物馆创意修复等。当然这种存真和重塑并重的守正创新,需要难以企及的境界和高度,不可能成为普适性的保护再生途径。

## 循环利用

美国著名景观设计师劳伦斯·哈普林早在1960年代就提出了建成环境的再生思想——建筑循环利用理论,即在保留建筑物形体空间的前提下,置换、活化其功能,改善、提升其景观品质。他设计的旧金山渔人码头吉拉德里旧厂旧厂改造,开历史建成环境再生风气之先,具有划时代的全球影响力。

既有建成环境的再生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70至80年代盛行欧美,涌现了纽约SOHO区(南休斯敦)的铸铁厂房,巴黎左岸的奥赛火车站,维也纳的煤气城等再生案例。21世纪以来,北京798电子旧工业区、上海新天地石库门里弄、上海世博园、深圳华侨城创意园区等都是这一影响的中国案例。

## 互适再现

再生以既有建成环境的保留改造为主,有必要添加恰当的新要素,作为活化的触媒或催化剂,但新旧要素间须有互适性。因而再生的价值取向不同于除旧布新的兜底式改造,而是在调适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前提下,对非保护的形体空间及运维场所进行“留改拆拼”的互适性再现。

其一“留”,是指除依法保护具遗产身份的对象,并要尽量保留具城市记忆和风貌延续价值的非遗产对象。

其二“改”,是指对保留对象进行品质提升的改良或翻建,不仅要谋划经济和文化价值增值,而且要考虑各权益依阶层的切合实际的适应性。

其三“拆”,是指拆除违章搭建,或权衡利弊后拆除失去再利用价值的低质非保护对象。

其四“拼”,应包括时空性的新旧拼贴与社会性的阶层和业态拼贴,这里的“拼贴”即“共生”,而“新”,是指与“留”“改”“拆”具互适性的“因旧而新”或“与古为新”,而不是“除旧布新”或“为新而新”。

## 中西攸关

“城市更新”一般有两种途径,一为除旧布新为主的替代性嬗变,以19世纪中的巴黎奥斯曼计划为代表,尝试了现代城市更新的第一种途径;二为保留改良为主的适应性再生,从“二战”后的重建,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建成物的循环利用,西方开启了替代性开发红利逐渐销蚀的第二种途径。西方的城市更新途径早于我国一个多世纪。

我国从农耕转向工业时代的城市更新,虽开始于19世纪后期,但直到20世纪末以来,以拆旧建新为主的大多数城市,才逐渐告别农耕时代风貌,仅保留了个别标本。如今随着产权关系固化和开发红利消弭,城市更新也转向了适应性再生的“留改拆拼”,中西在这方面的演进时差正在快速缩短。

## 结语

在纪念《威尼斯宪章》问世60周年,正逢建成遗产保护传承的机遇与挑战同在之时,其与城市更新的交集愈来愈频繁,矛盾也愈来愈突出。笔者认为,进一步厘清建成遗产话语范式及其基本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内涵和外延,是实质推进保护与再生事业的前提。因而需要首先在话语范式及其基本概念上正本清源,并能促进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

建成遗产的保护传承及其历史环境的活化再生,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业主、管理方、建设方、投资方和设计方,要在保护、保留、改建、翻建、添建,以及新旧共生等问题上,一案一议,对症下药,依规合法,守正创新,为城市更新中的保护与再生,找到得体的策略选择和解决途径。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教授)

西安探索:  
1950—2024 西安文化遗产保护

刘克成

西安是中国千年古都,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地,丝绸之路的起点以及世界东方古都的典范。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使西安在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扮演了一个探索者角色。

1951年,在新中国建设高潮中,西安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冷静地将城市发展区避开历史城区和主要遗址区,较好地处理了古迹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为保护西安城市文化遗产创造了根本条件,成为新中国优秀城市规划的典范。

1953年,中国考古学家在西安半坡第一次大规模发掘的史前聚落遗址,确立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开创了中国聚落考古学。1957年建设的西安半坡博物馆,是亚洲乃至世界第一个,采用建馆覆盖式保护遗址的遗址博物馆,确立了中国遗址博物馆的基本模式。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设立西安研究室,开展亚洲规模最大的城市遗址考古项目——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考古,经过长达70余年持续不断的艰苦努力,基本厘清了城址的范围大小、形制格局,发掘了城门、里坊、市场、寺院、官殿等重要建筑遗址,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都城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1974年,秦兵马俑的发现,揭开了世界“第八奇迹”的面纱,国家专项拨款建立世界最大的遗址博物馆群——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又一次为全世界所瞩目。

改革开放后,西安在城市化建设和古迹遗址保护之间,不断守正创新,寻找着平衡之道。1981年,西安编制出台了中国第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揭开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序幕。1983年,西安率先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修复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最为完整的城墙,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1985年,国家在西安建设完成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典范。

1995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在会议上,西安首次提出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设想。1997年,陕西省政府出资征收西安3000亩土地,启动全国首个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创造了大遗址保护的汉阳陵模式。1998年,西安完成全国首个大遗址保护规划——《汉阳陵保护规划》,并在2000年首创在全球范围征集汉阳陵遗址公园及遗址博物馆规划设计方案。

步入21世纪,西安吸收国内外最新理念,在古迹遗址保护方面不断开拓创新。2001年,在中央和陕西省政府支持下,秦始皇帝陵遗址公园在西安建成。2004年,唐大明宫丹凤门至含元殿片区遗址考古及保护工程启动,这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遗址保护工程,获得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界高度赞扬。2007年,西安启动全国首个国家大遗址保护与展示示范园区——唐大明宫项目建设。项目邀请全球9个国家,不同学派的专家共同建言献策,在遗址考古、遗址公园规划、遗址保护和展示、遗址公园建设和管理等多方面展开了全面探索和试验,用实践证明文化遗产保护也可以是城市发展的资源及动力。

## 人居型遗产的真实性探讨

邵甫

## “人居型遗产”的特点、价值与属性

“人居型遗产”的研究对象聚焦城、镇、村等活态遗产。他们既包括历史悠久的传统城市和村镇,也包括近现代城市和村镇;他们可以是整个历史城区和村镇,或是历史城区和村镇中的某个历史地段。人居型遗产能够为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特殊的见证,也是一种传统的人类居住地典范;同时,他还是一种活态的、容纳着城市日常生活的、依然处在生长变化中的遗产。人居型遗产具有遗产和人居双重属性。

## “人居型遗产”的挑战和“真实性”问题

人居型遗产的“真实性”往往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物质空间的衰败,以及城市开发对遗产本体及其周边环境的大规模改变,将直接对遗产价值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不可逆的破坏;第二,大量游客的涌入使遗产地面临超容量的游客、环境的污染、过度商业化、居民日常生活受干扰等问题;第三,当前遗产地社区面临严重的老龄化、空心化、居民对遗产价值认知不足等问题。因此,人居型遗产的“真实性”问题有三个方面。

作为“历史见证”的真实性:物质空间的真实可信和阐释展示的真实可信;

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范例”的真实性:人地关系传统智慧传承和创新;

作为“活态的日常生活空间”的真实性:持续变化中的管理。

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将可持续发展愿景融入遗产公约进程的政策》,提出了“环境可持续、包容性社会发展、包容性经济发展、和平与安全”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人居型遗产的“真实性”保护的重要原则和内涵。

## 历史城镇景观(HUL)十周年全球案例的启示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关于历史城镇景观(HUL)的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强调“历史城镇景观”不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而是一种在快速和持续的变化环境中管理遗产资源整体的跨学科的方法。其目的是在维持人类环境的质量,在承认其动态性质的同时提高城市空间的生产效用和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力。2008年,大唐西市博物馆在唐长安西市遗址上建成,这在历史城市中进行现代化城市建设开辟了一种新思路。

西安更是《威尼斯宪章》等国际文件与中国经验对话的前沿。2005年,第十五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西安举行。会议针对不断变化的城镇和自然景观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发表了关于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周边环境保护的《西安宣言》,成为自《威尼斯宪章》之后国际古迹遗址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文件之一。这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中国的首次大会。《西安宣言》的发表,说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积极参与者,以及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西安设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中心”,这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巴黎总部之外唯一的一个地区中心。同时,汉阳陵帝陵外藏坑遗址博物馆建成开幕,这是一个在遗址和遗址环境保护及展示方面运用国际领先理念、方法和技术的创新,被称为践行《西安宣言》的最佳案例,中国新一代遗址博物馆的代表,以及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的典范,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向全球推介。

如今,西安在数十年文化遗产保护的摸索中积累的经验,正在释放更高价值。2014年,以西安为节点,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这也是中国以及世界第一项成为世界遗产的丝绸之路文化线路。

2022年,由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合作共建的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在西安挂牌成立。在中华民族开始走向伟大复兴之时,在国家开始建设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之时,西安又被赋予新的使命,进行新的探索。2024年,春节假期的西安城人潮涌动,西安已经成为观众学习和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站。

半个世纪以来,西安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扮演了一个探索者的角色,西安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构成了独特的西安经验,成为中国以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常务理事)



平遥古城

可持续利用,以及促进社会和功能方面的多样性。

2021年,在《建议书》十周年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城市项目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历史城镇景观(HUL)十周年全球案例》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思路。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人居型遗产地在包容性社会发展、包容性的经济发展、遗产安全与韧性、遗产保护的管理规划和机制建设、遗产教育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做出的创新性探索。其中平遥古城入选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首先,在梳理历史文化资源与社会经济情况的基础上,对古城的价值进行重新认知,不仅具有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也具有经济、社会方面的地方性价值,既是古代金融之都也承载着现代的记忆和日常生活;其次,古城定位从单一旅游调整为“‘活着’的古城、宜居的遗产地”,提出“平遥共建”模式和“保护、人居、产业”三大策略;第三,在实施路径上,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在工作方法上,从“精英规划”到“共同缔造”,在治理体系上,构建“政府引领、专业协同、社会参与”的遗产地保护体系。

人居型遗产的空间和人的行为共同组成了其本真的“生活”。因此,人居型遗产既要坚持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原则,又要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应重视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居民幸福感;重视发展创新经济,增加就业,提升活力;重视创造平等对话机制,促进社区参与来实现“宜居、活力、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者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乡土建筑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本期报纸3版、4版图片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秘书处提供)